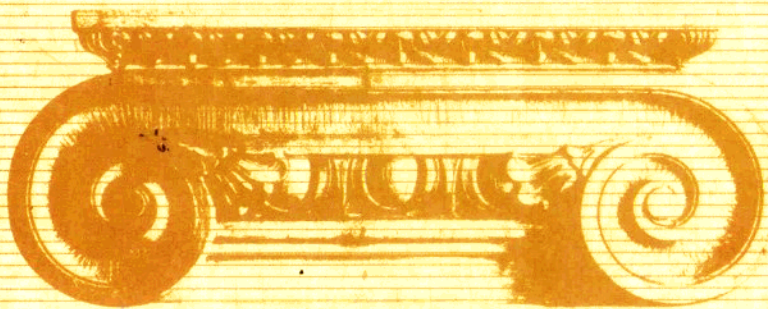


JURENZISHU

巨人自述



梁启超自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生平总述	(1)
求知问学	(20)
广推时务	(25)
奔走维新	(33)
宣传为业	(40)
域外游学	(62)
纵横政界	(76)
护国反袁	(95)
政党活动	(102)
政治思想	(123)
热心讲学	(141)
潜心学术	(165)
佛学徜徉	(182)
养心立身	(190)
情深如海	(204)
梁启超小传	(242)
梁启超年谱	(260)

生平总述

风云人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此余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日本东海道汽车中所作《三十初度，口占十首》之一也。人海奔走，年光蹉跎，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揽镜据鞍，能无悲惭！摭一既结集其文，复欲为作小传。余谢之曰：若某之行谊经历，曾何足有记载之一值？若必不获已者，则人知我，何如我之自知？吾死友谭浏阳曾作《三十自述》，吾毋宁效颦焉？作三十自述。

余乡人也。于赤县神州，有当秦汉之交，屹然独立群雄之表数十年，用其地，与其人，称蛮夷大长，留英雄之名誉于历史上之一省。于其省也，有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沉崖山，留悲愤之纪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乡名熊子，距崖山七里强，当西江入南海交汇之冲，其江口列岛七，而熊子宅其中央。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会，定居焉。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顾闻父老口碑所述，吾大王父最富于阴德，力耕所获，一粟一帛，辄以分惠诸族党之无告者。王父讳维清，字镜泉，为郡生员，例选广文，不就。王母氏黎。父名宝瑛，字莲洞，夙教授于乡里。母氏赵。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生一月而王母黎卒。逮事王父者十九年，王父及见之孙八人，而爱余尤甚。三岁仲弟启勋生，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

《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谦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至今诵此语不敢忘。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十五岁，母赵恭人见背，以四弟之产难也。余方游学省会，而时无轮船，奔丧归乡，已不获亲含殓，终天之恨，莫此为甚。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己丑年十七，举于乡。主考为李尚书端棻、王镇江仁堪。年十八计偕入京师，父以其稚也，挈与偕行。李公以其妹许字焉。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

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有所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学伪经考》，从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从事分纂。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而草堂颇有藏书，得恣涉猎，学稍进矣。其年始交康幼博。十月，入京师，结婚李氏。明年壬辰，年二十，王父弃养。自是学于草堂者凡三年。

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师，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六月，日本战事起，愤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人微言轻，莫之闻也。顾益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明年乙未，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之者，为南海先生，赞之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州道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为言官所劾，会封禁，而余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谭复生、杨叔峤、吴季清、铁樵、子发父子。

京师之开强学会也，上海亦踵起，京师会禁，上海会亦废，而黄公度倡议续其余绪，开一报馆，以书见招。三月去京师，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时务报》开，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著《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其冬公度简出使德国大臣，奏请偕行。会公度使事辍，不果。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复奏派为参赞，力辞之。伍固请，许以来年往，既而终辞，专任报事。丁酉四月，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怀，连衔奏保，有旨交铁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札来，黏奏摺上谕焉，以不愿被人差遣辞之。张之洞屡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辞。时谭复生宦隐金陵，间月至上海，相过从，连舆接席。复生著《仁学》，每成一篇，辄相商榷。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礪之者良厚。十月湖南陈中丞宝箴、江督学标，聘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就之。时公度官湖南按察使，复生亦归湘助乡治，湘中同志称极盛。未几，德国割据胶州湾事起，瓜分之忧，震动全国，而湖南始创南学会，将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余颇有所赞画，而时务学堂，于精神教育，亦三致意焉。其年始交刘斐邨、林墩谷、唐绂丞。及时务学堂诸生李虎村、林述唐、田均一、蔡树珊等。

明年戊戌，年二十六。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既痊，乃入京师。南海先生方开保国会，余多所赞画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荐，总理衙门再荐，被召见，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时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听谏行，复生、墩谷、叔峤、斐邨，以京卿参预新政，余亦从诸君子之后，黽勉尽瘁。八月政变，六君子为国流血，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去国以来，忽忽四年矣。

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

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己亥七月，复与滨人共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以为内地留学生预备科之用，即今之清华学校是也。其年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国维新会之设，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间美洲人招往游，应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岛，其地华商二万余人，相挽留，因暂住焉，创夏威夷维新会。适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义和团变已大起，内地消息，风声鹤唳，一日百变。已而屡得内地函电，促归国，遂回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闻北京失守之报。七月急归沪，方思有所效。抵沪之翌日，而汉口难作，唐、林、李、蔡、黎、傅诸烈，先后就义。公私皆不获有所救。留沪十日，遂去。适香港，既而渡南洋，谒南海，遂道印度，游澳洲，应彼中维新会之招也。居澳半年，由西而东，环洲历一周而还。辛丑四月复至日本。

尔来蛰居东国，忽又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惟于今春为《新民丛报》，冬间复创刊《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道铎之一助。呜呼，国家多难，岁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韩孔广诗云：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呜呼，笔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后所以报国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尝不惊心动魄，抑塞而谁语也？

孔子纪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

任公自述。（《三十自述》）

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治戴、段、王之学。千秋所以辅益之者良厚。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二人者学数月，则以其所闻昌言于学海堂，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无虚日。有为不轻以所学授人。草堂常课，除《公羊传》外，则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类》等，又时时习古礼。千秋、启超弗嗜也，则相与治周秦诸子及佛典，亦涉猎清儒经济书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决疑滞。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义”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不能禁也。又二年，而千秋卒（年二十二），启超益独力自任。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嫌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其后启超亡命日本，曾佑赠以诗，中有句曰：“……冥冥兰陵（荀卿）门，万鬼头如蚁，质多（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祖褐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此可想见当时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

烈(详次节)。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

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敝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已而嗣同与黄遵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臚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戊戌政变前,某御史臚举札记批语数十条指斥清室、鼓吹民权者,具折揭参,卒兴大狱。嗣同死焉,启超亡命,才常等被逐,学堂解散。盖学术之争,延为政争矣。

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积年余,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人焉。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

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其言曰：

我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而思想一窒；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姬得一钱，诟詈以相夺，情状抑何可怜？……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生之结果也。……（壬寅年《新民丛报》）

又曰：

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

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诸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饬遗我国民也。故吾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同上）

又曰：

掘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最易发生两种流弊。一、倘所印证之义，其表里适相吻合，善已；若稍有牵合附会，则最易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而缘郢书燕说以滋弊。例如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撷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求诸彼古代之希腊罗马且不可得，遑论我国。而比附之言传播既广，则能使多数人之眼光之思想，见局见缚于所比附之文句。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此等结习，最易为国民研究实学之魔障。二、劝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尝行也；劝人治此学，告之曰，吾先哲所尝治也；其势较易入，固也。然频以此相诏，则人于先哲未尝行之制，辄疑其不可行，于先哲未尝治之学，辄疑其不当治。无形之中，恒足以增其故见自满之习，而障其择善服从之明。……吾雅不愿采撷隔墙桃李之繁葩，缀结于吾家杉松之老干，而沾沾自鸣得意。吾诚爱桃李也，惟当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与杉松淆其名实者。（乙卯年《国风报》）

此诸论者，虽专为一问题而发，然启超对于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其所认为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途径，皆略见焉。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其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

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人焉而不深。彼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蘅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尚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清代学术概论》）

鄙人去国，十五年于兹矣。此十五年间，国中所经变迁，殆视百五十年为尤剧，无论物质的方面，精神的方面，以昔况今，皆如隔世。古诗称辽东化鹤，重返国门，人民城郭，疑是疑非。鄙人今日之感慨，殆类是矣。今坐中诸豪，虽强半旧交，然欲求十五年前在此地相与往还者，邈然不可复得，则人事迁移之急，可略见矣。此十五年间，刹那刹那，流转不住，以成今日之新现象。此新现象为迁而至善耶？抑况而愈下耶？此当付诸各人客观的判断，不能强同。以鄙人观之，则今日中国之地位，乃立于可以进化可以退化之中间，而进退惟国人所自择者也。外人之评我国，谓我社会凝滞不动，此在前此诚有然，试读西史，觉其变化流转，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特色，若佳山水无一处平板也。我国则自秦汉以迄清季，史迹若一丘之貉，盖二千年立于不进不退之域

矣。而自戊戌至今十五年间，乃由静而之动，悬崖转石，速率日加，至去岁而轩然起大波以有今日。虽其所动之方向，未敢断定，而其脱离永静界，则既有朕兆矣。所虑者，吾国人之情力性，受诸先天而不易拔，事过境迁，遽复其旧。据鄙人归国后观察隐微，此情力性已渐渐发现而侵入于多数人之心矣。其乐观者流，谓经此变革，国家当能自致太平，漠然不复知忧危，惟乘此以营其私计；其悲观者流，谓纪纲法度，废坠至此，人心风俗，败坏至此，陆沉在即，无复可救，吾亦惟颓然自放委心任运而已。此两种观察虽不同，要之其为情力性则一也，实则乐观者识量固愚下，悲观者志行亦薄弱。从来国家之兴衰，世运之隆替，皆由少数人以管其枢耳。凡欲我成就一事业者，必须责任心与兴味心两者具备。在坐诸公，皆国中贤者，其对于国家之责任心，甚深且固，鄙人熟知之，亦不劳更以此相劝勉。所欲为诸公进一解者，则兴味心而已。鄙人自问生平无他异人处，惟对于一切事，皆觉兴味浓挚。求学有然，治事亦有然，凡有可以劳吾心劳吾力者，则当其服劳之时与既劳之后，皆觉有无限之愉快，至于其勤劳所得之报酬如何，则不暇问也，以故亦永无失望沮丧之时。尝见法人布弥氏所著《大英国民》一书，极言英人之特色，谓其人脉、地理、气候、人种、遗传种种关系，养成好活动之天性，非活动则块然不乐，其蹴鞠、竞渡等团体竞争，终日不休，他国人骤视之，几不解其何谓，彼固非此不能娱乐也。而其政治上之活动，亦视之与蹴鞠、竞渡等为娱乐之一种，故他国政治家，失败之后，辄意气消沉，英人则无论为胜为败，泰然自若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英国政治所以常能为世界矜式者，皆以此也。要之，吾辈无论欲为何事，必先有兴味，然后有精神；必自有精神，然后能引起他人之精神。精神贯注，何事不成？若仁人志士，嗒然厌

世，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吾国今日，实处于极艰窘之地位。吾侨忧国之士，亦随之而处于极艰窘之地位，故吾愿以兴味之说进，愿诸君以今日欢迎鄙人兴味欢迎中国前途，则国家之福也。（《到京第一次欢迎会演说辞》）

今日在首善之区，得与吾同学诸君聚首一堂，而列席者竟有十余人，亦始愿所不及也。昔龚定庵有言：但开风气不为师，吾夙以其语有妙谛而服膺之。吾不敢自谓能开风气也，然窃有志焉。至于为师，则实不敢以自居，此非谬为谦让也。凡讲学大师，必以学问为唯一之生涯，以教育为唯一之目的，其行谊必严正使人矜式，其立言将以俟百世而不汲汲于一时。吾之性质，自问不足以当此。又以国家危迫，虽活动于稍广之范围，勉竭绵薄，挽回目前浩劫，故就其与同学之关系言之，以云精神之感通，则亲爱逾互，何俟多言；以云对于诸君曾有特别诱导之劳，则只增惭悚而已。

诸君中有相从于广州者，有相从于湖南者，有相从于日本东京者，实则与吾晨夕讲诵者，大率不通（过）三数月耳。吾辄牵于事他适，不能终业。就中曾深相砥砺者，惟丁戊间时务学堂耳。而当时共事之人，若谭浏阳、唐浏阳两先生，皆先后以身殉国。当时为同学所最相爱重者，若林、李、蔡、田诸子，悉与唐先生共命。盖庚子汉口之役，吾同学死亡过半，今尚生存者，除坐中诸子外，惟蔡松坡及其他二三人耳。当十余年前风气锢塞之日，吾同学诸君以区区数十人，人自为战，以与社会奋斗，虽矢亡援绝致身授命而曾不悔。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恃有强毅之精神贯注之而已。在吾辈今日，以与死亡诸君较，吾辈学问阅历，或稍有进于昔，若此种精神，能如昔时与否，盖有所不敢自信矣。今大局之危，甚于畴昔。吾侨负荷，任重道远。窃愿诸君常兢兢于后

死者之责，必思如何，然后他日可以见死友于地下也。

中国社会最易消磨人物，而斫丧其英气，自昔有然，今则尤甚。鄙人归国旬余，感此污浊之空气，已在于觉其可危。苟非有自克之毅力，常抵抗社会之恶潮流，则人而与之俱化。孟子不云乎：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已不自立，遑语于立人。则吾侪十余年来相期许相劝勉之初志，不其荒乎？吾侪若能常念昔年同学为国牺牲独立不惧之精神，庶乎可以告无罪于天下耳。（《莅同学欢迎会演说辞》）

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诸君足下：

数月以来，间读贵报，知公等所以督过之者良厚，吾自始固付之一笑，未尝校也。乃近者公等犹嗷嗷不已，日日以捏造事实诬人名节为事，鄙人为全国言论界之道德风纪起见，不能不有所忠告于公等，愿垂察焉：

公等之攻击鄙人，第一因其反对锦爱铁路，第二因其反对中美同盟。坐此与公等政见有异同，以逢公等之怒，天下无论何种政策，莫不同时有利害之两方面，缘此而论治者往往各有所主张，而中间容有辩论之余地，此各国之所同也。吾所主张，岂敢自谓其无误，特就其所见及者而论之耳。公等不以吾言为然，从而纠正之，此吾所最乐闻。公等所纠，而足以服吾之心，吾固不惮降心相从，若犹未也，则更相与往复其论，以求最后之真理，凡以言责自居者，不当如是耶？而公等徒以政见不同之故，而诬吾以受日本人指使，且日日闭门捏造新闻，此则吾所最为公等不取也。推公等之意，或良出于爱国热诚，以愤恨日本人之故，但使有政策可以排日本者，则虽加数倍之牺牲而不惜，而鄙人所主张，则谓我国数十年来以外交政策失宜之故，所牺牲者已不少，今良不愿更附益之，故于公等所主张，不敢漫然雷同。公等为感

情所激，乃至以窃钏之疑相加，即鄙人亦未尝不为公等谅，今更披肝沥胆，申明鄙人立论之根据，以释公等之疑，然后将鄙人历年来与日本人之交际，及其对于日本之态度，与夫吾之所自处者，据实直陈，愿公等平心听之！……

更奇者，吾此次薄游台湾，亦足以供公等造谣之资料，谓吾受日本台湾总督之招，将往颂其功德。殊不知吾游台之志，已蓄之数年，凡稍与吾习者，谁不知之。而此次之行，乃不知托几多人情，忍几多垢辱，始得登岸，而到彼以后，每日又不知积几多气愤，夫阅贵报之人，皆未尝与吾同游，则任从公等颠倒黑白，亦谁能辩者？然吾之此行，台湾三百万人，皆具瞻焉，一举一动，莫不共见，吾能欺人乎？公等之意，以为吾此行游记，于日本行政之美，必多所诵说，固得自实其言以为罗织之口实，夫吾数年来欲往台湾之本意，则固在调查其行政也，固欲举其美者以告我国人也。使此行所调查，而能令吾踌躇满志，则吾固不畏公等之罗织，吾必昌言之，无奈此行乃以伤心之现象充塞吾心目中，若有鲠在喉，非吐之不能即安，公等亦知我在彼日日所作游记，作何语者？公等亦曾见我在彼通信，作何语者？公等日日惟以闭门捏造新闻为事，不转瞬而所发现之事实，适与相反，其毋乃太心劳日拙矣乎？

公等又屡称吾尝以无担保品而借金于日本之正金银行，以是为吾受日人贿赂之确据。夫借金则诚有其事也，然此事之由来，人多知之。吾十余年播越于外，负债山积，债主以数十计，前年欲清理之，乃托神户一有力之商人，为介绍于正金银行买办之同乡人叶某者，求借数千金以清宿逋，约按月以卖文之资分还。其初则与叶某交涉，非与正金交涉也，乃无端而叶某破产失职，于是吾乃骤变为正金之债务者，正金日夜责偿，吾无以应，其极